

傅崇碧

大树参天护英华

我常常以深深怀念的心情，想起在“文化大革命”的最初两年，周总理领导我们同林彪、江青一伙掀起的反革命逆流作斗争的日日夜夜。那时我负责首都卫戍工作，是同周总理接触最多的两年。那些日子，林彪、江青一伙为了篡党夺权，打击、摧残、迫害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跟随毛主席革命多年的大批老干部，掀起了阵阵恶浪。周总理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大智大勇，砥柱中流，力排干扰，坚决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和党历来的干部政策，关心和保护老一辈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干部，同林彪、江青一伙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今天，当我回忆起这些往事，看到受过周总理关心保护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大批老干部，紧密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带领群众斗志昂扬地迈进在四化征途上时，怎能不深切地怀念周总理！

“不能开这个先例，
不能随便把人抓走！”

“文化大革命”中，林彪、江青一伙利用他们窃取的权力，大搞怀疑一切、打倒一切，掀起打、砸、抢和抄家抓人的恶浪。社会主义法制遭到肆意践踏，从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党政军负责同志的人身安全受到严重威胁。对于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这股邪风恶浪，周

总理旗帜鲜明地表示了反对意见。1966年12月初,江青、戚本禹等策动一些人,把当时中共北京市委的彭真、刘仁、万里等几个负责人抓走了。总理得知,焦虑不安。叛徒江青得意洋洋,说:“小将们下得真漂亮!群众起来了,你们想保也是保不住的。这一下你这个卫戍司令也甘拜下风了吧?”周总理立即指出:“不能开这个先例,不能随便把人抓走!”他指示卫戍区立即把人找回,要保护好被抓的人。我们很快找到了被抓走的人,报告了总理。总理批评了抓人的群众组织,给他们耐心地做工作,让他们把抓去的人交给卫戍区。我们按照总理的要求,制订好方案,报总理批准,把人送到总理指示的安全的地方。

但是,林彪、江青一伙利令智昏,他们哪里会听从总理的严肃劝告!他们煽起的打、砸、抢和抄、抓之风有增无已。在他们的指使、蛊惑下,有一些人竟要把重病住院的罗瑞卿同志抓走。总理知道了,让我告诉这些人:“绝不能乱抓人!”为此,陈伯达、江青一伙对我施加很大压力,质问我为什么不让抓?为什么阻挠和压制“革命群众的造反行动”?你对罗瑞卿是什么感情,为什么保护他?为什么“开红灯不开绿灯”?等等。话是对着我讲的,实际上矛头指向周总理。当时我回答他们:“要是允许随便抓人,警卫部队就没法按中央军委批准的警卫规定执行任务了!”但是,那些人根本不听总理的劝阻,还是想方设法把罗瑞卿同志抓走了。后来,经过总理反复做工作,才把瑞卿同志交给卫戍区。

从此,周总理更加注意指示我们加强警卫工作,提高警惕性。有一段时间,宋任穷同志住在京西宾馆,林彪、江青一伙在辽宁的支持者带领一群人去抓他。他们事先进行侦察和预谋活动,在夜间突然闯入宾馆,直奔宋任穷同志住室。我们的警卫部队闻讯赶去,那一伙人知道从楼道抓不走,便企图把宋任穷同志绑起来从窗口吊送到地面。楼房那样高,宋任穷同志年龄又大了,万一有点闪失,

就会粉身碎骨！此刻，我们的警卫战士迅速赶到，才把宋任穷同志解救下来，把那伙人赶走。我们把这一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非常关切地问：“宋任穷同志挨打了没有？受伤了没有？”要求我们继续做好对宋任穷同志的安全保卫工作。

不久，武汉发生了“七二〇事件”。毛主席、周总理通知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来北京谈问题，让他们住在京西宾馆，实际上是把他们保护了起来。这时，林彪、江青一伙又是蒙蔽群众开大会，又是组织大规模的示威游行，发泄他们对在“七二〇事件”中不赞成中央文革一套做法的陈再道等同志的仇恨，并煽动一些人冲击京西宾馆。有一天，7000多人突破了门外的警卫线，有几百人冲到楼上，情况非常紧急！总理要我和卫戍区另一位领导同志先后赶到现场，并指示我们：无论如何不能让他们把人抢走，一定要保护好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根据总理的指示，我们立即采取了应急措施，按事先制订好并经总理同意的方案，让陈再道等同志躲进一个不常用的电梯里，把电梯在9层与8层之间停下，告诉他们只有听到指定人给的信号才能出来。同时，反复地给冲击宾馆的人做工作，劝他们退出去。但是，由于有戚本禹等人在背后捣乱，这些人仍然不走。总理就把戚本禹找去，责令他“退兵”。总理严肃地说：“人要是被抓走了，你必须向主席作出交代！”迫使他们不得不有所收敛。在总理的关怀和指导下，我们保证了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的安全，粉碎了林彪、江青一伙把陈再道、钟汉华等同志置于死地的阴谋。

1967年8月份，在一次批斗会上，林彪的一个死党目无党纪国法，打了陈再道同志两个耳光。这一罪恶行径得到江青一伙的赏识，江青说他是造反派，有气魄。周总理当即严肃地指出：又不是3岁的小孩子，不能这样干嘛！总理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打人、挂黑牌子等歪风，苦口婆心地给群众做工作，讲道理，宣传党的政策和光荣传统，对群众进行正确的引导。

**“谁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
我马上挺身而出”**

我终生难忘周总理对陈毅同志的保护。陈毅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林彪、江青一伙要剪除他们篡党夺权的障碍，煽起了一股又一股打倒陈毅同志的妖风。周总理旗帜鲜明地同他们进行了斗争。他们策动一些人批斗陈毅同志，想在批斗会上把陈毅同志揪走。周总理就指示我们，警卫部队部署在主席台下边，把陈毅同志保护起来。周总理还亲自参加大会，坚决反对“打倒陈毅”的标语和口号。为了表明他的态度，教育受蒙蔽的群众，不等“批判会”开完，他愤然退出会场，同时命令警卫人员保护陈毅同志也离开会场。但有一伙人居然把陈毅同志抢走了。总理立即指示我们派部队把他救护出来。有一次，林彪、江青一伙指使一伙人围攻总理，扬言要拦截陈毅同志的汽车，要冲到人民大会堂去揪斗陈毅同志，致使总理连续18个小时不能吃饭，心脏病犯了。总理气愤地说：“谁要在路上拦截陈毅同志的车子，我马上挺身而出；你们要揪斗陈毅同志，我就站在人民大会堂门口，让你们从我身上踏过去！”

还有一次，由陈毅副总理主持在北京饭店举行招待会。当时，林彪、江青一伙正煽动一些人抓陈毅同志，揪斗陈毅同志。周总理指示我们：一定要保证陈老总的安全！陈毅副总理对我们开玩笑说：“呵！总理把我交给你们了！”去北京饭店时，没有发生什么问题。到了饭店，我们发现有不少形迹可疑的人。我们便把陈毅同志的汽车停在正门，没等招待会结束，就把车子开走了，那伙人被引到车子开去的方向；招待会结束后，我们用另外准备的车，从另外的门，把陈毅同志接回中南海。陈毅同志笑着说：“谢谢你们了！”这时，总理又查问此事，得知陈毅同志已安全返回，才放了心。由于总

理坚持斗争，林彪、江青一伙妄图揪斗陈毅同志的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当我军杰出的领导人罗瑞卿同志遭到林彪、江青一伙残酷折磨的时候，周总理要求我们对罗瑞卿同志“要保护好，要保密，不要被人抢走”。针对林彪、江青一伙煽起的那股歪风，总理规定，不准搞“喷气式”，不准打人，不要挂黑牌子，不准游斗，不准抢人。后来还指示不准体罚，不准侮辱人格，要保障生命安全，等等。我们坚决执行了总理提出的这些保护罗瑞卿等同志的措施和要求，这就再一次触动了林彪、江青一伙的反革命神经。他们在一次会上对我横加指责，说什么“群众要求”斗罗瑞卿，这是出于“义愤”，你为什么搞条条框框？江青破口大骂罗瑞卿同志是什么“反革命”，质问我：你不斗他，他就斗你，你懂吗？陈伯达阴阳怪气地说，罗瑞卿是十九兵团的，当过你的政委嘛！我说：我们是按中央指示办的，不遵守中央指示，我们怎样完成任务？以后，罗瑞卿同志几次住院做手术，林彪、江青一伙残酷地摧残折磨他，伤口还没愈合，就要他参加批斗会。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指示：手术期间不能批斗！有一次罗瑞卿同志动大手术，我们向中央和中央军委提出在手术期间不宜批斗的请示，很快得到周总理和叶剑英、聂荣臻同志的批准。但是，林彪、江青一伙早就想把罗瑞卿同志置于死地。他们根本不顾总理一再指示，也不顾罗瑞卿同志病重身残，操纵一伙人最终将罗瑞卿强行抢走，频频地批斗，使罗瑞卿同志备受折磨。

“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呵！”

周总理担负着处理党和国家日常事务的繁重工作，许多国际友人都说他是“世界上最忙的人”。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最动乱的年代，他夜以继日地工作，忘我地、不知疲倦地为党和人民操劳。他常常顾不上吃饭，顾不上睡觉，有时连水都顾不上喝一口。我们

见他操劳过度，日益消瘦，劝他适当注意休息。他总是说：“我是总理，就得什么事也要管呵！管不好怎么向党、向人民交代！”周总理对许多受到林彪、江青一伙凶暴批斗的老干部、老同志，总是竭尽可能加以保护。他领导我们做好这方面的工作，不仅交任务，还教方法。听说一位老干部被批斗，他告诉我们事先怎样准备好部队，怎样准备好汽车，万一发生危及被批斗人安全的事态，立即把人抢救走。有一次，他亲自指示我们要准备好一架直升飞机，当被批斗的同志人身安全受到威胁时，立即运走。

周总理和聂荣臻同志曾经指示我们，给科学家们增加警卫力量。但是，江青却说：为什么要保护“反动学术权威”？有一次，林彪、江青一伙策动一些人批斗一位对我国国防现代化有重大贡献的科学家。这位科学家被接出家门时，总理要求我们向他报告情况。随后，在到达会场中、在大会进行时、在把人送回后，又多次要我们报告情况，直到这位科学家安全地回了家，周总理才放了心。

周总理曾经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带着我们到几位老师的住地，视察那里的安全警卫工作，一处一处地给我们作指示。在林彪、江青一伙大反所谓“二月逆流”、抓“军内一小撮”时，有一些群众组织受这帮反革命的煽动、蒙蔽，要冲击老师们的住地。我们把得到的情况报告周总理，总理把我们找去研究保护措施，要我们把老师们安排在安全的地方，加强那里的警卫工作，并与我们一起研究万一这些老同志的安全受到威胁时，需要采取什么应急措施。当我们把落实的情况向他报告时，他还再三叮嘱我们，一定要加倍小心地保护好老师们。

1967年“八一”建军节前后，林彪、江青一伙掀起了冲击中央军委领导同志的恶浪。“八一”招待会前夕，总理告诉我们，徐向前同志必须去参加招待会，你们一定要保证他路上不出事！我们把徐帅护送到招待会上，总理又嘱托我们，一定要保证徐帅在回家的路

上不出事。我们考虑，回去的路上出事的可能性更大些，就增派了警卫，协同有关单位，用三辆警卫车跟着他，并兜个大圈子，把徐向前同志安全地送回家。

1967年夏天，住在中直招待所的李井泉等几位老同志，先后被人抓走游斗。我们把这个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很为他们的安全担心，指示我们派出部队，保护他们的安全；还让我们把住在招待所的王任重、江渭清等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负责同志，立即送到卫戍区部队的一个安全的住所保护起来，并嘱咐我们要严格保密。江青一伙听说找不到这些同志了，竟当着总理的面声色俱厉地问我，把人弄到哪里去了？接连两天吵吵闹闹。我见总理不理睬他们，也就不吭声，追问紧了，我就说了句：“上面知道。”后来我见到毛主席，向他报告了对这些同志的保护措施，主席赞同地说：“总理做得好！你们卫戍区保护得好！”第二天，江青一伙又来拍着桌子追问，我理直气壮地说，你们去问主席吧！他们一听，不敢再追问了，只问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说我不是早就说过上面指示的吗！事后我把向主席汇报的情况报告了总理，总理爽朗地大笑起来。那20多位大区和省、市委的负责同志被保护在卫戍区部队营房以后，总理还专门指派了一位同志，每隔一天去探望一次，了解他们的生活情形，给他们送文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

在林彪、江青一伙迫害贺龙同志的时候，周总理亲自派人把他接到中南海，以后又亲自参与研究，给他选定一处隐蔽、清静、保密的住所，指示我们派部队把他保护起来。总理亲自过问他的医疗和生活问题。但是，尽管有总理的极力关怀和保护，林彪、江青一伙还是加紧了贺龙同志的迫害，设立专案组对他进行审查，有关贺龙同志的事都改由专案组负责。他们多方刁难、折磨贺龙同志，经林彪的死党批准，用偷梁换柱的办法，从外地派了一个脑系科护士，冒充卫戍区的医生，把原来护理贺龙同志的医生换走。在他们的折

磨摧残下，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在我国人民中享有崇高威望的贺老总，过早地离开了我们。

万万没有想到，我按照总理指示，保护毛主席领导下的大批老干部、老同志，竟成了林彪、江青一伙的眼中钉，他们对我也下了毒手。我个人也亲自领受了周总理充满阶级深情的保护和关怀。1968年3月22日夜，林彪、江青一伙一手制造了所谓“杨、余、傅事件”假案。我遭受政治迫害离开北京的那天，总理的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仍然与我一起在人民大会堂吃了饭，分别时，总理紧握着我的手说：“要把身体搞好，要经得住考验，以后有的是工作做！”他还嘱咐有关的领导同志照顾好我的生活。1974年，毛主席亲自批准为我平反冤案，我回到北京，见到了总理，总理紧紧握住我的手，激动地说：“见到你太高兴了！”我这个在炮火硝烟中长大的人，很少哭过，这时也禁不住流下热泪。后来我才知道，为了平反我的冤案，那几年，总理不知花了多少心血。这是多么令人铭心刻骨的关怀啊！

我回忆的仅仅是若干往事中的几件。对于总理的关怀和保护，许多老同志都有各自的亲身感受。我们的周总理真是参天大树护英华啊！想起这一切，就牵动我对总理的深切怀念之情。特别是当我参加一些重要会议或者一些重要活动，看到健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和老同志们聚集一堂，共商党和国家大事的时候，就想起了总理的亲切教诲，想起了总理对老干部的关怀。当时如果没有周总理顶着林彪、“四人帮”掀起的逆流，保护了这些老同志，他们今天会是怎样呢？真是不堪设想啊！

敬爱的总理，我们深深怀念您！

（选自《周恩来的最后岁月》，中央文献出版社1995年12月初版）

张佐良

周恩来的最后 1323 天

我从 60 年代初开始从事中央领导人的保健工作，经常出入中南海，对红墙里的情形较为熟悉。初进中南海时的那种神秘感和好奇的心理随着岁月的流逝、紧张的工作、受到的种种教育和眼界的开阔而渐渐地代之以责任感及工作压力。

1965 年夏，上级领导决定要我到周恩来总理身边去工作，我心里充满了兴奋与激动，同时也有点紧张，因为人们都说周总理很严厉，不知道自己能否适应得了，把工作做好。是年 8 月中旬的一天，邓颖超大姐为了给周恩来物色一名保健医生，她带病约见了。我听说她的身体一向不大好，年轻时患过肺结核，如今又患胆道功能共济失调、轻度甲状腺机能亢进、结肠过敏与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等多种疾病，在家里养病已有多时。邓颖超大概听了一些有关我的情况介绍，可能看过我的档案材料。自然，她还是要亲自见我，跟我谈话，以便直接观察我、了解我。邓颖超在中南海西花厅家里见我，她知道我是红小鬼出身，自然先有了许多信任。见面之后，她跟我谈话极为随便而自然。首先谈了她自己的健康情况、跟多种慢性病作斗争的态度和她同医生的关系等；其次，她向我介绍了周恩来的健康和性格，教我如何同周恩来相处，因为周恩来的工作非常繁忙，要求我们为周恩来做任何事情都要见缝插针，注意工作方法，不要随便去干扰他，否则，你有再好的动机也达不到良好的效

果。如果遇到了什么不好解决的问题，她会尽力帮助我；最后，她向我介绍了西花厅工作人员的情形。通过邓颖超的这次亲切、坦诚、理解和关心人的谈话，使我消除了思想顾虑，对日后做好工作有了信心。

1965年秋天的一个下午，北京医院总值班室有人通知我：“总理办公室来电话，叫你马上去西花厅。”

我骑上自行车急匆匆地赶到了西花厅。值班的警卫同志看到我满头大汗，马上告诉我：“不要急，总理还没有起床，我们估计他快要打铃了，叫你提前到这里来等着，怕你来不及。这是邓大姐交代的。”他们让我在客厅里等候。

周恩来早晨一起床就按电铃，召唤管他生活的值班警卫人员和秘书。从他进卫生间“方便”和洗漱的那一刻起，就开始了一天的工作日程。如询问秘书，在他睡眠时有何紧急传阅的文件、电话记录与当天的日程安排等问题；他也向秘书交代一些急需处理的事情。

值班室的电铃响了，邓颖超来到了客厅。她笑呵呵地跟我说：“你来得正好，总理刚起床，到卫生间去了。我跟他说好了，让你见他一面。你在这里先坐一会儿，等秘书出来，我会叫你一起去见他。”

周恩来的工作实在是忙，生活节奏快。在他身边工作的人员，决不能慢悠悠地迈着四方步走路，一听到电铃声都得跑步到他身边。今天，邓大姐见缝插针般地安排我来见总理，真是不容易。片刻工夫，有人来到客厅引我到周总理的卫生间。邓大姐走到卫生间前轻轻地叩了一下门，便推门进去。我跟在她后面，她向总理介绍：“这一位，就是我跟你说的张佐良大夫。”这时，周恩来刚做完晨间锻炼，身上穿着睡衣。过去，尽管我多次见过周恩来，但像这么近距离同他说话，还是头一次。看样子，年近古稀的周恩来，气色很好，面部皮肤白而细，略微红润，头发斑白，两鬓染霜，额头和眼角处的

皱纹较浅，眼袋不明显，两颊部的络腮胡子处皮肤刮得发青，浓眉下那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喔，张大夫，听说你是个孤儿。你老家在什么地方？”周恩来微笑着同我握了一下手。总理那带有浓重苏北口音的说话声是大家所熟悉的。

“我出生在上海，老家在浙江硖石，在我年幼不懂事的时候去过，现在已经没印象了。‘八·一三’淞沪战争使我家破人亡，成了孤儿，在上海流浪。后来被人领养到苏北，1947年参加新四军，解放后上医科大学学习。”我听人家说，周恩来与人初次见面，总要询问姓名、年龄、籍贯与家住何方等问题，为了怕耽误他时间，我事先准备好了腹稿，简明地向他介绍了自己的经历。

“你也不容易啊，上了大学，当了大夫。”周总理听后微微点头，转而亲切地问道，

“你有几个孩子啊？”

“一男一女共两个。”我答道。

“好么，我这里没有多少事情，大姐的身体不大好，你多照顾她就行了，好，就这样吧。”他向我交代说。

这便是我初次见到周总理的情形。

四个红细胞的背后

转眼过去了六七年，这真是史无前例的年头。周恩来作为一个“救火队长”，日夜处理着雪片似飞进“总理值班室”的“十万火急”的电报。保人、救人，解放干部；制止武斗，恢复交通，抗灾救灾；他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毅力肩扛着行将倾倒的大厦。

可周恩来毕竟是年逾古稀的血肉之躯，长年的超负荷工作和抵挡明枪暗箭，终于使他累垮了。

1972年5月12日，我在为周恩来作每月一次的小便常规检

查时，在显微镜高倍视野下，发现了4个红细胞。啊，红细胞，有4个！我的心里为之一怔。虽然一般认为，男性尿常规检查发现四个红细胞，是多了点，但也不一定有什么特殊的临床意义。不过，问题是发生在像周恩来总理这样的伟人身上，即使是小问题也就成了大问题，因此绝不能粗心大意，抱任何侥幸心理；我必须顺着这4个红细胞紧紧地追查下去。

在那“特殊”的岁月，人民把期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谁都明白，周恩来不能病倒，周恩来不能垮；我是他的保健医生，岂容马虎。这个小小的信号，是否提示他体内确有隐患，心里确实没有底。

于是，我避开了他人，急切地用保密机给我国著名泌尿外科专家吴阶平院长打了一个电话，向他通报尿常规检查发现的问题。吴阶平听后，不无忧虑地说：“张大夫，你想办法再多复查几次小便常规，建议你们请病理科专家作尿细胞学检查。”

同时，我将周总理的小便常规化验发现4个红细胞，跟吴阶平通电话及吴院长的建议等情况，向中南海门诊部主任卞志强作了口头汇报，以便他能将情况随时报告汪东兴同志，汪东兴会掌握时机，必要时向毛泽东主席口头报告周恩来的病情变化。

吴阶平的建议，无疑是正确的。要是对待一个普通病人就好办了，只要叫他留下小便标本，随时送到医院去复查就是了。可是，疾病发生在周恩来身上，就不那么简单了。你想要他复查小便，他会刨根问底，向你提出好多个“为什么？”你若没有把握向他解释清楚，令他听了觉得有道理，那你准会碰钉子。周恩来一天到晚，党、政、军各方面的大事，内政和外交工作排得满满的，真叫是日理万机，绝不可、也不该轻易去打扰他。

为了如何才能说服周恩来接受小便复查这件事，我食不甘味、夜不成寐，真叫伤透了脑筋。过了两三天，我读了一些有关的医学文献，向泌尿科专家请教了相关知识，头脑稍为冷静了一点，最终

归纳出“说服”周恩来接受小便检查的五点理由：

1. 老年人血管硬化，管壁通透性增加，可能使红细胞渗出血管壁；

2. 泌尿系统结石，长期磨擦出血；

3. 膀胱内炎症，引起黏膜充血；

4. 肾脏血管畸形；

5. 膀胱内长肿瘤。

我的这些“解释”能否让总理听得进去，我只好先去讨教邓颖超大姐。邓大姐已事先知道这些情况，她还是听完了我的解释。

“你是好意，下了不少功夫，但不能太急；他正忙的时候不要去跟他说，说了也听不进去，得找机会。你的说法，我听了没有什么意见。”邓大姐的首肯也很重要，起码使我鼓了勇气。

一天下午，我从秘书那儿得知总理不外出开会，在家里办公。我耐心地等待周恩来去洗手间的时机，紧随其后，待他一切都办利索了，到洗脸池旁洗手的功夫，我凑过去抓紧机会发表“演说”：“总理，我向您报告一下这次检查身体的结果。”

“有什么问题吗？”他问道。

“这次小便化验，发现有几个红血球……”，我在向他报告了其它几个检查项目都属正常之后，以平和的语气这么说。

“有多少红血球？有问题吗？”他未待我把话说完，便接着问。

“有 4 个红血球。”我注视着他的神态，缓缓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因为，周恩来曾因我说话太快批评过我。

周总理懂得不少医学常识，他亲自过问当时中央几位死于患肿瘤的重要领导人，如陶铸、陈毅、彭德怀以及王进喜等人，他对有关医学知识是一清二楚的。

“小便里有几个红血球，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他提高了嗓门说。

“总理，不是发现几个红血球，觉得大惊小怪，应该把尿中出现红血球的原因搞清楚。”我继续解释道。

周恩来平素认为我这个人“好辩”。其实，我那里敢跟总理“辩”呀。我心里想的只是要把问题解释清楚；但有时也引起误解，他以为我故意顶撞他，变“好辩”为“强辩”；自然，我亦担心他以为我由“强辩”变成“狡辩”。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周恩来并不介意我对他的“好辩”或“强辩”，更没有认为我有意“顶撞”他。关键问题是我说话、做事，决不善观气色，而是讲老实话。

这时，他已洗完了手，往卫生间门口走去，但走路的步子比平时慢，似乎愿意听我讲下去。我便接着说：“几位专家讨论过了，大家认为有五种可能性：第一，血管硬化；第二，泌尿系统结石；第三，泌尿系统感染……”

“你不要第一，第二的，跟我兜圈子么，有话就直说，我看，你们最不放心的是怕我长肿瘤吧？嗯？”周恩来有些不耐烦了，打断了我的话。其实，他这么说倒是一矢中的，切中要害。

看来，问题已经说开了，我也就大着胆子试探着继续解释道：“总理，在各种癌瘤中，膀胱癌的恶性程度是最低，只要治疗得早，大多数是可以根治的。根据国内外的经验及统计资料表明，大约1/3的病人可以根治；另外的1/3病人则会反复发作；剩下的1/3病人，其后果就不……”

“最后那些病人就是死亡，对吗？”他似乎心不在焉，没有仔细地听我讲完，便直截了当地说。

我想，他很可能认为一个人只要得了癌症，治愈的希望是非常渺茫的；况且，在“文革”期间，他曾亲自过问的多位患恶性肿瘤的中央领导人，都是久拖不治，痛苦地离开了人间；若是按照医生的意见，把我周恩来弄进医院去，七检查、八折腾，且不说是否能把毛病查出来，即使查出来是恶性肿瘤，从根本上说，也没有好的治疗

办法，而身体倒可能彻底搞垮了；那样，自己吃了苦头不算，又会误了许多工作，所以他才会那样心不在焉。

“是的。”到了这个时候，我只好如实回答。

“那你说了这么多话，到底想要我做什么呢？”此时，总理倒是认真起来了。

“专家们希望，要反复多做几次小便化验，方能作出最后的诊断。”我明确地向他报告了专家的意见与建议。

周恩来，这一次几乎是笑着说：“原来是要化验小便，你不早说，这有什么难啊，什么时候化验？现在就要查吗？”

“是的，如果有小便，最好马上留下标本，送到北京医院检查。”我紧抓住机会不放。

我说完话，立刻转身到卫生间，取来早已准备好的玻璃尿壶，请总理留下了少许小便标本，即派人送往北京医院病理科检查。

第二天，尿化验的报告单出来了。化验单上写着：“8个红细胞！”离上次尿常规检查仅仅是三天时间，红细胞却增加了一倍。更糟糕、更令人揪心的是——那要命的“癌细胞”还是出现了！尿细胞病理检查报告单上赫然写着：“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

北京医院病理科主任极为负责，他请最著名的细胞病理专家之一、中国医学科学院肿瘤研究所的杨大望教授，及协和医院、解放军305医院、301医院的病理科主任会诊，仔细研究尿涂片染色细胞病理学检查结果，大家一致认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诊断可以确定。

在“文革”期间，“老爷卫生部”已被整垮了，一些高级保健医疗单位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我们上面没有真正的业务领导部门具体指导工作。专家队伍中，大多被扣上“反动学术权威”、“××国的特务”或者是“牛、鬼、蛇、神”等帽子，而不能工作了。后来，有些专家被下放劳动，或是参加医疗队，一时间，几乎找不到专家为党

中央领导人看病。唯有吴阶平院长始终没有被打倒，一直得到中央领导人信任，真可说是“硕果仅存”了。吴阶平学识渊博，待人谦和，没有一点大专家的架子。我们这一代从事党中央领导人保健工作的医生，都觉得他对工作特别热情，认真负责又乐于助人，从不借故推托，我们都非常敬重他。自然，我们在工作中不仅会遇到业务问题，也会碰到一些不好处理的难题，需要求教于他，他常能恳切地提出解决问题的办法。

现在，周恩来得了膀胱癌，我们感到事关重大，立刻将病理学专家们一致得出的“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之结论，打电话通报了吴阶平。吴院长听完了我通报之后，用异常焦虑的语气跟我说：“佐良，你还是多请几位泌尿外科大夫一起来看看吧，大家在一起再多商量一下，集思广益，看看还有什么好的办法。”他如是说。他说完话，便提出来请友谊医院泌尿外科主任于惠元、协和医院泌尿外科吴德诚教授等人，一起在中南海会诊。

专家们会诊时提出，即刻派专家携带细胞学检查的涂片标本等资料，赶赴天津、上海两地，请那里的专家会诊。当即决定，由中南海门诊部派一名医生随吴德诚教授前往。他们在天津请虞颂庭、在上海请中山医院泌尿外科老前辈熊汝成教授等人会诊。至5月18日，已集中了津、沪两地的泌尿外科临床及病理学专家们的意见，跟北京病理学专家在看法上未持异议。

最后，为郑重计，我们将京、津、沪三地著名专家都请到北京来，进行了多次讨论，大家对于周恩来患“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的诊断意见完全一致。

这时，我们同吴阶平等一起商量将周恩来的病情，向党中央写了书面报告，详细叙述了目前病人没有任何症状、应争取及早治疗的好处，制订了切实可行的诊疗方案和疾病发展的不良预后等。

自从说服周恩来接受反复化验小便以来，他很认真，每次去卫

生间解小便，都注意叫人帮他留取尿标本作化验。与平时不同的是，他不再像以往那样，询问尿化验的结果如何。我认为，这并不是周恩来的疏忽大意，也不是他对自己的病情不在意。谅必，他已经敏锐地从保健医生及专家们的言行中察觉到问题的某些症结。譬如，按惯例，保健医师应当主动向他汇报每次化验的结果；现在，小便化验已经做了好几次，结果早已出来了，但医生及专家们同他见了面，没有人主动跟他提及此事，似乎有意在回避他。

作为政治家的周恩来，此时亦不愿难为医生。医疗组成员的心情是极为矛盾的，既不希望周恩来向医生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可又希望他能得到及时治疗。

这期间，周恩来的工作实在太忙，抽不出时间作进一步检查是主要原因；而早期膀胱癌患者没有任何自觉症状，无丝毫痛苦或不适而影响到他的工作与生活，是次要原因。

从尿血到西山别墅

1973年1月13日清晨。这天大清早6点多钟，周恩来批阅完大量文件离开了办公室，按他的习惯，仍怀抱着一大摞文件放到他卧室的床头边；邓颖超大姐常戏称这摞文件为“他的金娃娃”。然后，他去卫生间洗漱。解小便时，突然排出大量鲜红色血尿，使整个抽水马桶里的水都变成红颜色了，把照顾他生活的当班警卫科长老张吓坏了。

此时，我在内院东厢房里刚洗漱完毕，吃了安眠药躺到床上。忽然间，房间里急迫的电铃呼叫声持续不停地响了起来（平时只响几个），紧接着，我听到急匆匆的脚步声来到我的房门外，咚咚咚地敲了几下门，我只说了声“进来！”老张已推门进来了。

我见到老张神色紧张、气喘吁吁，手里举着玻璃尿壶。此时天色已经大亮了，他高声嚷道：“张大夫，你瞧，这下子可糟了，小便全